

他们为何能成为收藏大家?

——从清代山东金石收藏五大家说起

□纪尚

诸城刘喜海

刘喜海(1793年—1853年),出自诸城刘氏,家世显赫,从清初累世为官。六世祖刘必显(1600年—1692年),顺治九年(1652年)进士,曾任户部广西司员外郎;五世祖刘染,康熙二十四年进士,历任江西按察使、四川布政使;高祖父刘统勋,曾任东阁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,谥号文正。刘统勋的长子刘墉,就是大家熟知的“宰相刘罗锅”,为官清廉,曾查办和珅贪污案,谥号文清;次子刘堪(刘喜海的祖父)早卒,其子刘鑑之(刘喜海的父亲),由伯父刘墉抚养成人。刘鑑之乾隆五十四年中进士,曾任户部、兵部、吏部等三部尚书,谥号文恭。

作为名门之后,刘喜海自己也很争气。他于嘉庆二十一年(1816)中举人,官至四川按察使、浙江布政使。

刘喜海少年时就喜欢金石收藏,他在《嘉荫簃论泉绝句》自注中说:“余束发受书,即嗜古泉。”十八岁到北京求学后,刘喜海更是如鱼得水,四处搜求古物。对于有价值的藏品,他还亲自拓印,得到墨本,方便研究与交流。

二十一岁时刘喜海花费重金,从北京一家古董店购得后来闻名于世的颂簋。簋高30.1厘米、口径24.2米,不仅工艺精美,而且器盖内有15行152字的长篇铭文。该青铜器上世纪50年代入藏山东省博物馆,被誉为“镇馆之宝”。

四十岁开始,刘喜海离开京师,历任福建汀州知府、陕西延榆绥道、四川按察使、浙江布政使等地方官。每到一地,在处理政事之余,他都将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和研究古物上。在四川时,他留意收购有铭文的青铜器,在他的影响下,地方收藏家改变了“只以花纹色泽及完好者是珍”的做法,逐渐注重器物的文化历史价值:“晚以文字多者为贵,虽残缺亦无伤。”辞官浙江时,他曾经花费千金,购得虢叔鼎,一时传为美谈,被《清稗类钞》记载。

刘喜海一生收藏宏富,钱币、青铜、碑帖、封泥、古籍等都极为可观。他有金石拓本五千通,重要的青铜器有父丁方鼎、鱼父癸方鼎、宋公鼎、善鼎、季辱簋、且癸爵、父爵、史父辛爵、旅父乙爵等。

他还是金石学研究大家,注重器物的编目、辑录、绘图、考证等,有《金石苑》《嘉荫簃藏器目》《古泉苑》《长安获古编》《海东金石苑》等著作。

海丰吴式芬

吴式芬(1796年—1856年),字子苾,号诵孙,山东海丰(今无棣县)人。与诸城刘氏一样,海丰吴氏也是人才辈出,被誉为“进士世家”“九世朝臣”,时人称赞吴家:“四省承宣三掌节钺,九封光禄两列史

山东地区的金石收藏传统,自古有之。金石学初兴的北宋,就有诸城人赵明诚、章丘人李清照夫妻,倾其所有收买金石器物,并写出著名的《金石录》。清代中晚期是金石学的又一个高峰,山东同样收藏名家迭出,如诸城的刘喜海、海丰的吴式芬、潍县的陈介祺、福山的王懿荣、黄县的丁树桢、利津的李佐贤等。如果综论家学渊源、收藏质量、研究成果,则以刘喜海、吴式芬、陈介祺、丁树桢、王懿荣五人更胜一筹,堪称清代山东金石收藏五大家。



曾为刘喜海藏品的颂簋,现藏山东博物馆。

吴式芬投身金石收藏,受家庭影响很深。曾祖父吴垣,好古成癖,精于鉴赏,广涉金石,在圈内小有名气,著名金石学家毕沅称:“余与公卅年金石交也。”祖父吴之勤,同样喜爱金石器物,收藏有西周“虞司寇壶”一对和苏轼使用过的“雪堂宝砚”等珍品。吴式芬的外祖查氏家族,也是收藏大家,外祖父查礼收藏有一面汉代铜鼓,因此将书斋命名为“铜鼓书堂”,著有《铜鼓书堂遗稿》。

幼年即酷好金石文字的吴式芬,三十五岁起供职京师,他广交古董界的朋友,尤其留意金石器物的拓本,收藏日丰:“余自庚寅以后游京师,获交当代好古诸家,每遇古器,必手自摹拓,而四方同好亦各以所藏拓赠,所获寔多。”

拓本之外,吴式芬收藏有铜器七十七件、汉封泥三百多方。最珍贵的要数祖父留给他的一对虞壶,他的书斋“双虞壶斋”即因此得名。在双虞壶斋的书桌前,吴式芬勉力著述,有鉴于《寰宇访碑录》以时间为序,查找不便,且多有舛误,他按照地域重新修订,编成《金石汇目分编》。他还有《据古录》二十卷,收录自商周至元代金石文18128种,《据古录金文》三卷九册,共考释有铭文的钟鼎彝器1329件,以及《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》《双虞壶斋日记八种》《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》等,可谓著作等身。

让人欣慰的是,吴式芬的儿子

吴重熹,与山东另一位收藏大家潍县陈介祺的女儿结婚。受双方家庭的影响,也喜好金石,曾在陈州搜集汉砖数百方。吴式芬去世后,收藏品也由他保管、研究,吴重熹后来整理校订刻印了父亲的金石书稿,使之流传于世。

潍县陈介祺

陈介祺(1813年—1884年),字寿卿,号簠斋,山东潍县(今潍坊人),道光二十五年进士,官至翰林院编修。父亲陈官俊,嘉庆十三年进士,官至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。

岳父李璋煜是嘉庆年间进士,京城金石圈的名人,藏有商父癸爵、兕形父乙举、汉大梁鼎等珍品,著有《爱吾鼎斋藏器目》。正是在岳父的影响和支持下,陈介祺步入了金石的殿堂。42岁回到潍县后,陈介祺再未出仕。在故乡,他依托扎实的家庭、浓厚的兴趣,将全部精力用于金石收藏与研究。

论收藏品的丰厚,陈介祺称得上晚清第一。他的藏品类别齐全、数量众多、质量上乘,包括青铜器、玺印、石刻、陶器、造像、砖瓦、古币、泉范、碑帖等,总量超过两万件。其中被称为“海内三宝”之一的毛公鼎,有铭文499字,是已知铭文最多的西周青铜器。《清史稿》对他的评价是:“介祺绩学好古,所藏钟鼎、彝器、金石为近代之冠。”

论研究成果的丰硕,他被奉为金石学界的泰山北斗,著有《簠斋传古别录》《簠斋藏古目》《簠斋藏古目并题记》《簠斋藏镜全目》《簠斋吉金录》等。他还精于全形拓等墨拓技术,在照相术还未流行之前,留下了青铜器物的三维造型。

在古印、封泥的研究方面,陈介祺开了先河。他收藏有三代及秦

汉印7000余方,并将自己的小楼命名为“万印楼”。有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《簠斋藏古玉印谱》,以及与亲家吴式芬合撰的《封泥考略》等专著。

福山王懿荣

王懿荣(1845年—1900年),字正儒,山东福山(今烟台福山)人,光绪六年进士。他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,在金石学领域的成就已尽人皆知,在此我们不过多展开,只说说他的家学渊源。

始祖王忠,明洪武年间任山东登州盐场盐课大使,至王懿荣共十六世,累世为官。祖父王兆琛,嘉庆二十二年进士,官至山西巡抚;父亲王祖源,道光二十九年拔贡,曾任兵部主事、成都知府,官至四川按察司使。

王祖源爱好金石,在京时,经常带儿子王懿荣逛琉璃厂,搜寻金石:“京秩清苦,父子尝易衣而出,然性耽金石古玩,日流连于厂肆中,量力购置,虽箪瓢屡空弗恤也。”王懿荣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,走上了金石收藏研究之路。

黄县丁树桢

丁树桢(1861年—1915年),字干圃,号陶斋,山东黄县(今龙口)人。与其他收藏家相比,丁氏虽然重科举,但却以经商闻名,是富甲一方的大族,时称“丁百万”。据《丁氏族谱》:“清康熙间,子孙积累渐厚。乾隆中,元鹏、元沂、际云等科第仕宦亦渐显,遂蔚为黄之巨族。”

丁氏家族从丁元沂(1738年—1798年)开始,经营典当等金融业务。名下的当铺、钱庄数量众多,有案可查的就有202座,遍及国内十省。据说丁家人从黄县到北京,

一路上不需要住旅馆,住在自家的当铺就可以了。

丁氏后人,如丁葆筠、丁鲁臣、丁佛言等均喜好金石收藏。1916年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佛言,收藏的龟甲、彝鼎、泉鉴、陶玉、拓片等有七八千种,有《说文古籀补》《续字说》《说文抉微》《还仓室述林》《古玺初释》《古陶初释》等著述,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。

丁树桢也不遑多让,他家大业大,在金石收藏中投入巨资,仅三代青铜器就有200余种。收藏品有亚形鹿鼎、湛鼎、三年师兑簋、父戊簋、曾侯簋、射妇桑鉴、虢叔旅钟、作宝尊彝鼎等,是清末有名的金石收藏家。丁树桢经常委托古董猎手,在各地搜寻珍宝。光绪年间,洛阳龙虎滩出土三体石经,其中《尚书·君奭》残石就由丁派来的人员购得。该石经残片非常珍贵,拓本的价值就达十金。刘喜海收藏过的西周颂簋,后来也归丁树桢所有。

为什么是他们?

五大收藏家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,和以下三个因素密不可分。

一是有家底。金石器物,主要包括青铜器、石刻碑碣、竹简、甲骨、玉器、砖瓦、封泥、兵符等。年代久、铭文多的精品,价格都不菲。如著名的周虢叔钟,铭文较多,有征、同、文、四行四十字,鼓、左、文、六行五十字,1821年时,曾以一千二百两白银的价格售出;1872年冬,又以五千两白银的价格再度成交。即便是青铜器之外的普通器物,价格也居高不下:“南中古物不独金器为有力者,收括殆尽,即碑帖书画磁玉等类稍可入目者,价便奇贵。”能拿出余钱购买这样的非生活必需品,必须有厚实的经济基础做支撑。

二是有文化。清代文人收藏金石,不是为了谋利,也不在炫耀,而是研究铭文。“好古必以文字为主也。爱文字之心,必须胜爱器之念。”通过辨读古文,得到史籍中缺失的资料,达到证史、补史的目的。在当时人看来,金石器物只是铭文的载体,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:“金器无文字者,仅与废铜同价。”研究金石,绝非茶余饭后观赏把玩那样简单,而是需要墨拓、制图、考证、考据,需要较高的古文字和历史学修养,门槛是很高的。

三是有兴趣。金石不会说话,铭文大多数只有寥寥数字或数十字;金石文字与通用文字差别又很大,难以辨认、解读。金石研究因此是枯燥的,需要能耐得住寂寞,有枯坐书斋的定力。没有兴趣作为基础,很难坚持下去。

综合来看,家族所起的支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:书香门第、仕宦之家的子弟,既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作研究、著录,又有足够的资金可投入器物收藏,师长、同学的熏陶,也能将他们引入金石收藏研究之路。正是因为这些有利条件,刘、吴、陈、丁、王等人才成为山东五大收藏家。